

及时和值班预报员通气商量。

实践使我认识到：要报准天气，不仅要认真学习群众经验，注意发现天气变化的各种征兆，而且更要运用毛主席的光辉哲学思想进行辩证地分析，既考虑一般规律，还要注意特殊规律。1974年为了做好汛期旱涝预报，我带领预报员深入农村开老农座谈会，当时多数老农认为雨水偏少，只有舜生公社老农邵志祥一人根据腊月24，年30晚和正月16刮西北风，预报汛期雨水偏多。回站后我和同志们一起，立即运用资料对两种不同意见进行分析验证，发现邵志祥老农意见从资料上反映对应关系很好，3个关键日有14年出现西北风，其中13年汛期的雨水偏多。但我还不放心，又两次登门找老邵，深入探讨，最后结合其他理由，作出了汛期雨水比常年偏多的预报，结果预报准确。1976年，邵志祥亲自来我站，又提出汛期要发大水。他说：3个关键日刮西北风了。但又提供这次还出现了雾。我抓住雾这个异常现象，结合其他天气预报工具，通过反复研究，认为这雾的出现，破坏了3个关键日“刮西北风要发水”的一般规律，因而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后来运用其他天气预报方法与群众经验，预报汛期雨水比常年少一半，结果实况明显偏少。

为了把群众看天经验与现代气象科学技术相结合，使自己逐步从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我还常常向预报人员学习气象知识，学习对天气形势的分析，气象资料的运用，边学边干边使用。1974年我发现“闷热生暴”，有时不闷热同样有暴的特点，为了进一步掌握这个规律，我就从资料着手，普查了历年7月份暴雨两个例62个，一个个排列下来，还选择9种要素，总算抄录了15,000多个数据，经常工作到深夜，最后制作了一张多种要素综合普查表，以后，我又花了2、3年时间，进一步分析研究，根据出现暴雨前后的气象要素变化特点，用不同的指标，分出了“白天暴”、“夜暴”、“开头暴”、“雨中生暴”、“暴中有暴”等5种情况，再结合形势分析，总结出“冷性暴雨”、“暖性暴雨”、“连续性暴雨”这3种类型以及各型的指标，在暴雨预报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我常常要求同志们在农事关键时刻，一定要主动及时地做好预报服务工作，决不能放马后炮，更不能“帮倒忙”。同时抓住重要关键季节，亲自上阵把关。不论是春播育秧期，还是汛期，我总是经常不离值班室，重要天气亲自主持会商，亲自审查签发，亲自与预报员一起向县委汇报。在县委需要根据天气作出生产重大决定的时候，果断地拿出比较明确的天气趋势意见。1975年6月下旬，我们扬州地区南部，三次陡

降暴雨，邻县有的雨量达500毫米左右，本县上空也乌云翻滚，雷声隆隆，对我县威胁很大，县委打算部署全部腾空水位迎战雨涝。这时，我立即发动全站同志进行认真讨论分析，认为沿江地区暴雨的出现，说明矛盾已在那里激化，结合天气形势的演变，不可能在我地再产生特大暴雨，在未来半个月内也只能有2—3寸雨，不会造成需要全部腾空河水的严重局面。于是迅速向县委负责同志作了汇报。县委采纳了这个意见，除在特别低洼地区已腾空一部分水位外，其他地区作了两手准备，结果到7月中旬只下雨102毫米，节约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年6月，县防汛指挥部传来了关于长江中下游要出现1954年那样的洪水通知，县委对此十分重视。我和全站同志一道，查阅了历史上大水年的气象资料，认真分析其规律，结合群众“腊雪多，天主旱”的经验，反复研究，预计“今年梅雨不多，7月雨要多些，但也不会出现象1954年那样的大水”，并向县委和防汛部门作了汇报。实况是6月份没有发大水，但7月7日至12日连降暴雨达200毫米，汛期开始紧张。这时，我又与大家对天气形势、历史资料和群众经验进行综合分析，集体会商，仍然认定今年没有达到1954年大水的条件，结果7月中旬末转为少雨，没有发生洪涝。就这样，使我逐步取得了领导预报和开展服务工作的主动权。

我在为革命学习和掌握气象业务技术方面，虽然做了一点工作，取得了一点成绩，但是，距离客观形势的要求，还差得很远。在英明领袖华主席抓纲治国的战略决策指引下，我决心继续革命不停步，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革命到底，为气象事业的发展，为早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 《气象》月刊征订启事

《气象》月刊是中央气象局主办的中级技术刊物。为适应新时期总任务和气象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今后本刊的内容主要是交流天气、气候，大气探测，人工影响天气，农业气象等方面的技术方法和经验；开展学术讨论；报道气象科技发展动向；介绍国外先进技术。供气象台站科技人员、科研工作者和院校师生阅读。定价每本0.20元。请读者及时向当地邮局办理1979年度订阅手续。